

邓小平如何严格要求党的高级干部

□ 张文良

从历史上看，邓小平作为老一辈革命家，一直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，率先垂范，以上示下，为全党全社会作出表率。

1979年，改革初兴。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脱离群众，搞特殊化时有发生，极大影响了党的形象。为了整肃党风，邓小平亲自推动出台《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严格规范高级干部生活待遇，要求高级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中起带头作用。《规定》对于抓好新时期党的作风建设，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要求加快制定《规定》

至1979年，改革开放正在全力推进，各项事业陆续进入正轨，但干部思想和作风问题还需整顿。党内有少数领导干部利用职权，谋求私利，生活特殊，影响恶劣，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，使党的威信受到损害。邓小平非常重视这个问题，密切关注这些不正之风，要求有关部门尽快研究对策。

1979年7月，华润公司工矿部一干部给邓小平写信反映，福建、广东一些领导借落实侨务政策为名，行受贿之实，明目张胆地伸手向华侨索取大量物资，还美其名曰“赠送”“捐献”。对此，邓小平深恶痛绝。他批示：“这个问题值得十分重视。对已发生的事件，建议中检委进行调查，对性质严重的，需要严肃处理，以儆其他。但最重要的是，在最短期内，制定出几条必须遵守的章程和纪律。”并提出：“由中检委为首，约集有关部门和粤闽两省同志，开一小会，拟出几条，报中央批准后，立即施行。”10月4日，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《关于在受理华侨捐献中严禁违反政策和营私舞弊的若干规定》。同时，在邓小平的推动下，1979年下半年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牵头组织，各有关方面参加，起草了《规定》。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，他几次审

阅过稿，政治局会议也多次进行讨论。

11月2日，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为《规定》作动员报告，严厉批评了干部特别是某些高级干部中存在的特殊化现象，要求严格执行《规定》，恢复和发扬艰苦朴素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。

亲自对高级干部进行动员和说明

为了消除干部的疑虑，让《规定》顺利执行，在1979年11月2日的大会讲话中，邓小平亲自作了说明。

关于制定《规定》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恢复一些好的传统，反对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特殊化。《规定》基本重申了以前的一些规定，把以前的老章程恢复起来，没有更多新的苛刻的规定。当前，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就是：反对干部特殊化。不仅在高级干部中，在中下层干部中也有。“人民群众（包括党员、干部）普遍地对特殊化现象（包括走后门）不满意，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问题闹事……有的人追求舒适生活，房子越住越宽敞，越漂亮，越高级。有的人为了自己的方便，可以做出各种违反规章制度的事情。这使我们脱离群众，脱离干部，把风气搞坏了。人们对这些现象很敏感。”他指出：“这不单是一个党风问题，而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，成了一个社会问题。现在，我们先从对高级干部的生活待遇作出规定开始，再逐步地作出关于各级干部的生活待遇问题的一些规定，克服特殊化。只要高级干部带头，这个事情就好办了。”

关于干部特殊化的危害，邓小平认为，干部搞特殊化必然脱离群众。“我们的同志如果对个人的、家庭的利益关心得太多了，就没有多大的心思和精力去关心群众了，顶多只能在形式上搞一些不能不办一办的事情……脱离群众，

脱离干部，上行下效，把社会风气也带坏了……如果我们高级干部首先把这方面存在的问题解决了，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解决全国在其他方面存在的这类问题。”高级干部不仅自己搞特殊化，而且影响了自己的亲属和子女，把他们都带坏了。“有少数同志在本单位、在其他地方，反映都不大好，很多是由于子女干了坏事，家长背了黑锅……现在有些干部的子女可以随便看机密文件，出去随意扩散，个别的甚至向外国人卖情报，送情报。”“我们的高级干部现在并不是工资太高，而是其他方面的待遇太宽了。这样就要脱离群众，脱离干部，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，把风气带坏了，官僚主义也无法克服。”

关于《规定》的具体施行，邓小平认为，“从我们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起，大家都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。有困难要忍耐一下。只有这样，我们大家才有发言权……但是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。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，是知道要得罪人的。会有少数人思想不通，我们就先得罪这少数人……要想通这个问题。不但自己要自觉遵守这个规定，而且要做好自己的亲属和子女的工作，做好有关人员的工作。”“这个规定一经中央和国务院下达，就要当作法律一样，坚决执行，通也要执行，不通也要执行。”

《规定》的施行

1979年11月13日，《规定》和邓小平的报告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一起正式下发到全国县团级，并通过各种形式传到海内外各界。

《规定》的内容共10项，对高级干部的住房、用车、食品供应、外出休养、文化娱乐、遗属生活安排等方面做出详细严格的规定。

比如，要求一个高级干部的宿舍只能有一处，不得同时占用两处。调到外地工作时，应将原宿舍交回。家属不能随迁的，其宿舍另行安排。宿舍的面积

在滕代远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

——一位警卫秘书的回忆

□ 卜占稳

滕代远同志是新中国第一任铁道部部长。1951年12月20日，他那里需要警卫人员，我就被调过去做他的随身警卫。在此之前，我任职于公安部八局，从未和他见过面，只知道他原是华北军区副司令员，于1948年8月调到中央军委铁道部任部长。

我原先听说他脾气不太好。因此，当公安部领导带我去见他时，我心中特别害怕，总担心哪一句话说不好，惹他不高兴。然而，在第一次交谈中，他给我留下了截然不同的印象：对人和气，有什么事情会和你商量。此外，他还将工作任务讲得非常清楚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原先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从此，我就严格照着他的指示办。

用车标准和规矩很严

在刚进城时，他坐的是辆老得不成样子的汽车，而且还经常坏，几乎影响到正常工作。司机多次提出换个好一点的，他总是不同意。

有一次，办公厅一位副主任出面，在天津买了两辆苏联“吉斯”牌汽车。向滕部长汇报后，他当时就决定一辆都不要，并说这种车只有副总理级才能坐，我们买了也不能用，让赶紧退货。因为退货晚了一步，有一辆车非买不可，就把车取回来停在铁道部车库里。放在那里一年多，电瓶都放没电了，其他地方也有损坏。后来新提拔了几位副部长，部里没有那么多专车，非用这辆“吉斯”不可了。我们就又和他商量，他还是坚决不坐，说：“请吕正操同志坐！”吕正操同志（时任铁道部副部长）也不坐。最

后，我们只得再去劝说滕部长，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，他才同意乘坐。

1953年，他为制订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方案，率代表团访问苏联。访苏期间，苏联运输部部长卡冈诺维奇送给他一辆“吉姆”车。回国后，他立即给周总理写报告，称自己坐“吉斯”车不合适，请求上交给政务院，苏联同志送的“吉姆”可以由他乘坐。在报告中，他还反映了部里新提的几位副部长的用车困难。周总理同意了他的意见，“吉姆”车留给他用，“吉斯”车移交给政务院；同时，还批了一辆新“吉姆”车给铁道部。

除了坚决执行用车标准外，他对专车的使用也定下了严格的规矩：家属不得用车；客人来看望他，坐谁的车来就坐谁的车回去；不坐车来的，回去也不派车送。他的车不准用来送客人，我跟随他工作20年，只有一次例外：一位老同志来看望他，走时已经太晚了，家离得远又没有公共汽车，滕部长这才让我用专车将老同志送回去。

政务院有文件规定，首长私人用车要自己出车费，每公里一角钱。他看到这个文件后表示坚决执行，要求司机认真统计乘车公里数，并要求司机到有关部门结账前，先向他汇报跑了多少公里。

他将严格的用车风格带到了视察工作及休养的每个地方，也影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。每到一地，他都尽量避免给当地添麻烦，还特别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不能随意用车，一旦发现问题就会严厉批评。他的严格自律给所到之处的行政管理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

此外，他在节约方面也很注意身体力行。不管是在家还是在办公

要有限额，由国务院做出规定。已工作的子女可以同住，如不能同住，其住房原则上由所在单位解决。已安排宿舍的，不准再占用宾馆、招待所。高级干部宿舍，除按规定附设的会客室免收房租，其他用房按面积收取房租。水电费也要根据实际消耗，按比例分摊。

其中也有具有时代“特点”的规定，比如凡高级生活用品，如电冰箱、电视机等，今后一律由个人自理。原公家已经配备的，一律按市价合理折价处理给本人。本人不要的，由公家收回，不得以任何理由长期无偿占用，化公为私。在那个年代，冰箱、电视等物品还是高档物品。

比如，部长以上干部，每人配备专车一辆。临时需要增加车辆，由有关单位派车。常务副部长、外事和公安部门副部长及65岁以上的年老体弱的副部长，根据工作需要，每人可配备专车一辆。其他副部长一般不配备专车，由所在单位根据需要，保证用车。家属子女单独外出不供车，因特殊情况必须用车的，按乘坐里程收费。

比如，不准用公款请客送礼。不得以试用、借用等名义，无偿占有或低价购买国家和集体生产的产品。各部门各地区和生产单位，不得以任何名义向高级干部个人赠送物品。在外事、外贸活动中，接受对方赠送的礼品，除价格不高的零星纪念品外，一律交公。

《规定》要求各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，高级干部应自觉遵守。今后凡违反规定的，要进行批评教育；对错误严重、情节恶劣的，应给予纪律处分。

《规定》下发后，在规范高级干部生活待遇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邓小平高瞻远瞩，及时发现问题，突破重重阻力，坚决反对干部特殊化，带头执行，在整风肃纪中作出了表率，展现出一名共产党人光明磊落、无私奉献的本色。

（摘自2018年第2期《党史博览》，原标题为《邓小平反对高级干部特殊化》）

1921年，党的一大召开时，鉴于党内党员少等特点，中央只设由3人组成的中央局。党的二大、三大、四大，虽然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，但中央机构仍是中央局。

1927年4月27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。此时，全国地方普遍成立区、地执委会，工农运动空前发展，北伐大革命轰轰烈烈，党员人数也由1925年1月中共四大时的994人激增至57967人。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大党，中央机关仅有中央局的状况已不足以有效领导全党，因此急需“使中央成为强有力的中央”。中央政治局应运而生。

1927年5月9日，中共五大闭幕，大会选出了31名中央委员和14名候补中央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。5月10日，党的五届一中全会召开，选举陈独秀、蔡和森、李维汉、瞿秋白、张国焘、谭平山、李立三、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，苏兆征、张大雷等为候补委员，选（后增补瞿秋白、谭平山）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，陈独秀任总书记。这标志着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设立。

1927年6月的《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》，在党的中央机关一章对中央政治局做出了规定，主要内容是：

第一，中央政治局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，中央政治局的成员包括中央委员会总书记、若干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。政治局候补委员参加政治局会议时，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，正式政治局委员离职时候补政治局委员依次递补。第二，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职责是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。第三，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成，主要职责是处理党的日常事务。从党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来看，党的总书

中央政治局是如何设立的

□ 王定毅

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产生。

这项规定第一次对中央领导机构及工作机关的组成、职责、相互关系等做出了明确规定，并将决策机关（中央政治局）与负责日常工作的机关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）分为两个机构，健全了党的中央机关，有利于增强党的集体领导，为以后党的中央机关的组织建设奠定了基础。

坚持党的领导，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，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。中共五大确立了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体制，从这以后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一直是党的领导核心。这个组织制度和领导体制建立以来，除中途有个别调整外，一直活用到今天，对于加强党的领导、贯彻民主集中制均发挥了重大作用。

（摘自2016年9月27日《人民日报》）

事工程学院毕业后，先在部队机关担任参谋，之后被分配到某部队当连长。他听说后有点不高兴，说：“你有什么资格当连长？大学毕业就当官儿，这不合适，没有实际当兵的经验，不能体会战士的心理，不能了解战士们实际的思想状况，又怎么能领导好一个连队——100多个人的一切，包括衣食住行等问题。我建议，你回去向你们领导汇报，就说是你爸爸的意见，要求先到基层去当几年兵，领导考虑你能行再提你去当连长。”久明回部队后，马上向领导作了汇报。部队领导也采纳了他们的意见，将久明放到辽宁锦县的一个基层部队，一年多后才提升为连长。他后来对久明说：“你这才取得了当连长的资格嘛。”

他的第四子滕久耕（即滕飞）参军后，在连队当炊事员，一干就是两年多，每年都被评为“五好战士”。不论分配什么工作，他总是勤勤恳恳做好，由于工作突出，被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。《中国青年报》还曾刊登过他艰苦奋斗、勤俭节约的先进事迹。1970年8月10日，在执行公务中，滕飞乘坐的卡车撞在山上，他不幸从山坡摔下来，受了重伤。当时，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滕老正在广东从化养病，林一同志（滕代远同志的夫人）身体又不太好。滕飞所在部队打电话通知家属，说可以让家属来探望。我心里很着急，不知道该如何向他们去说这件事。但当我最终告诉他们后，滕老嘱咐我代表他们去部队看望，并对我谈了他的两点意见：一是滕飞要是去世了，你不要提出任何要求，丧葬一切由部队安排；二是如果有可能，请部队想尽一切方法进行挽救，他还年轻，现在只有23岁，还能对党为国家多工作几十年。家属的意见就这些，没有别的要求。我听了以后，心情非常沉重，话都说不出来。

作为一个老革命家，在自己亲生肉肉的生死之际，他心中想的依然是党和国家的利益。每每想到这里，我就对滕老肃然起敬。

（摘自2016年第10期《秘书工作》）

『打老虎』始于何时

□ 刘学礼

在党史上，“老虎”指的是较大的贪污分子。“打老虎”指的是严肃惩处一些大贪污犯。从我党历史发展来看，“打老虎”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“三反”运动。

1951年12月底，全国开展“三反”运动。其中，“打虎”运动是一个重要阶段。1952年1月19日召开的中央直属机关总党委扩大会议，首先宣布“三反”运动进入“打老虎”阶段。1月23日，毛泽东批评了认为党的机关、宣传和文教机关、民众团体，用钱不多，必无大“老虎”的错误认识。1月25日，毛泽东又指出，“三反”

运动的第三阶段是组织精干力量搜捉大贪污分子，捉大、小“老虎”（1000万元以上的为小“老虎”，1亿元以上的为大“老虎”。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大“老虎”。当时的1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万元）。随后，各地党委统一领导指挥“打虎”行动，研究“打虎”战术，掀起了轰轰烈烈的“打虎”运动。一些大贪污犯被严肃处理。华北军区政治部一名副科长兼任电影院的经理后，两年多来贪污灯片费、场场费和盗卖公物所得共达1.2669亿多元（相当于现在1.2万多元）。1月21日，这名副科长被开除党籍、撤销职务、交军法处严惩。到2月5日，仅华东军区就捉到大“老虎”108只、小“老虎”649只，搜出中小贪污分子9.7万多人。在“打虎”过程中，毛泽东要求严禁逼供信，严格检查核实，实事求是甄别，“打虎”工作和业务并举。

为了有效惩治贪污分子，1952年4月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》公布实施，该条例明确规定了有关贪污问题的处理方针、办法、步骤及批准权限等，使有关的工作进入审判程序。

（摘自2015年第1期《党史文苑》）



滕代远（左四）和苏联运输工程部部长在武汉

室，甚至出差住招待所、住宾馆，都坚持人走灯灭，能用小灯泡绝不用大灯泡，不需要的灯不开。他常说：不是我拿不起这点电费，而是为国家节约用电，将电用到工业生产上，就是为国家多生产了产品，这里就有个人的一份功劳。

关心职工群众生活

有次滕部长视察沈阳铁路局期间，走访了一个行车公寓，他一进门就发现室内很暗，灯泡亮度不够。他问公寓管理员：“你们的被子多长时间洗一次？”管理员回答：“一个月洗一次。”他又问：“被子里有没有虱子？”管理员说：“可能有。”他当即就翻被子，被子特别黑。打开被子后，马上发现一只很大的虱子，他非常生气，当时对身边的分局局长、公寓管理员说：“限你们一个星期内将墙刷白，灯泡换成大的，要使乘务人员能够读书看报。乘务人员每次用过的被子褥子都要马上换洗，务必让他们休息

严格的家风

他的第三子滕久明从哈尔滨军